

第一章 酒文化——香

绵亘的酒史钩沉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 酣高楼——酒的起源

酒是人类各民族民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种饮料。酒自出现以后，便与生活紧密相连。同时，酒与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我国是酒的故乡，也是酒文化的发源地，是世界上酿酒较早的国家之一。在夏代，我国就已能人工造酒。例如，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酒”字（图 1-1）和与酒有关的“醴、尊、酉”等字。

中国人酿酒的历史悠久，从文化意义上说，酒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合体：一方面酒是物质的饮料；另一方面酒承载了中国精神的诉求，包含有深刻的哲学、诗文、科技、艺术乃至于安邦治国的道理，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所谓中国酒文化，是指酒在生产、销售、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总称。它既有酒自身的物质特征，也有品酒所形成的精神内涵，是制酒饮酒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特定文化形态。

中国酒的起源，晋代文人江统在其“酒法”一文中总括道：“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之空桑，积郁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肇自上皇”，即在传说中的远古时代伏羲氏时期就有造酒；“不由奇方”，即最初的酒不是人为制作，而是无意中发现的，由粮食或果品自然发酵而成。

那么，中国酒的起源说到底有哪些呢？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仪狄造酒说、杜康造酒说、猿猴造酒说和上天造酒说。



图 1-1 中国“酒”字

仪狄造酒说

仪狄造酒说，始载于《世本》中“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认为仪狄是最开始制作酒的人，“变五味”即酒有多种口味。《战国策》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绝旨酒。”大禹将这种美味可口的事物命名为“酒”。同样东汉许慎在撰《说文解字》“酒”条时，也记载“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三国蜀汉学者谯周著《古史考》也说“古有醴酪，禹时仪狄作酒”，都将仪狄奉为酒的发明人。

仪狄或许是一位善酿美酒的匠人、大师，或许是一位监督酿酒的官员，总结前人的经验，完善酿造方法，酿出质地优良的酒醪，故被后人称颂为“酒祖”。

相传仪狄在田间劳作，家人将饭送到田间，当时耕田的四周长有桑树，为了腾碗，他就把吃剩下的饭用桑叶包起来，放在金家泉流出的浣河边。几天后，他发现溅过泉水的桑叶包里流出了充满香味的汁液，拿起一尝，绵香可口，非常甘美。此后他经过反复琢磨、实验，用金家泉水多次调制、品尝汁液，最后发明出酒。

石碑《村语》云：“仪狄村祖秘方传，福我境地醴甘甜。上有千载衍后代，天赐神造袭平安。”为纪念仪狄造酒的功绩，2012年4月4日，“首届中国酒祖仪狄文化节”在中国白酒的发明人仪狄出生地——河南省宝丰县商酒务村隆重举行。

还有一种说法是：

有一天，仪狄到深山里打猎，希望猎得山珍美味，为大禹做美味的料理，却意外发现了一只猴子在喝一潭发酵的汁液，原来这是桃子所流出来的汁液。猴子喝了之后便醉倒了，而且脸上还露出十分满足的样子，于是仪狄也想亲自品尝看看。尝了之后，感到全身热乎乎的，很舒服，整个人筋骨都活络了起来，大为惊奇。

当时，大禹的病痛一直未见好转，并且还与共工作战，十分伤神。仪狄赶紧将在深山所发现的汁液拿来给大禹饮用，大禹被这香甜浓纯的味道深深吸引，胃口大开，顿时觉得精神百倍，体力也逐渐恢复，大大增加了对抗敌人的胜算。鉴于大禹对酒的肯定，仪狄便决心自己来研究制作，在旁人的帮助之下，终于完成了第一次的造酒（图 1-2）。仪狄尝试喝了一口，但是味道



极其不好，原来汁液还没有经过“发酵”这个步骤。经过多次试验之后，仪狄最后制作出各种美味的酒，此后造酒技术渐渐地流传到各地。

对于仪狄造酒的说法，后人颇有怀疑。例如，《黄帝内经》已有黄帝与医家岐伯讨论“汤液醪醴”的记载，《神农本草》又肯定神农时代就有了酒，都早于仪狄的夏禹时代。考古发现，酿酒早在夏朝或者夏朝以前就存在了，如在磁山文化时期就有一些形制类似于后世酒器的陶器和大量谷物，谷物酿酒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人们将仪狄奉为“酒祖”，说明了后人对仪狄造酒总结工作的肯定。

杜康造酒说

曹操在乐府诗《短歌行》中写道：“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此间的“杜康”已然成为酒的代名词，也成了我国酿酒业的鼻祖、酒圣。

杜康（图 1-3）何许人也？



图 1-2 仪狄造酒



图 1-3 酒圣画像

西晋人张华撰《博物志》一书认为杜康是汉朝时的酒泉太守。民间传说他是一个手艺高超的酿酒师，他酿造的美酒在陕西、河南一带享有盛誉。

据明万历年间《直隶汝州全志》载：杜康就是现在的杜康村。该村三山环抱，一溪旁流。村南杜康河里流水潺潺，清澈见底，其中酒泉沟一段，百

泉喷涌，清冽碧透，夹岸树木葱郁，景色宜人。可见“杜康造酒”是可信度较高的民间传说故事。

《说文解字》“帚”条中有说：“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明确提到杜康是“秫酒”的初作者。秫，即粘高粱，也作高粱的统称，据此可推测杜康可能是用高粱酿酒的创始人。在粮食作物中，高粱比黍、稷、粟、稻的出现要晚一些。杜康在总结前人酿酒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用高粱来酿酒。可能由于他的手艺高超，加上高粱的特性，酿出的酒味道很好，人们尝了这种酒，觉得别有风味，于是杜康善酿酒之名鹊起，为后人奉为“酒圣”。因此，古书《杜康造酒醉刘伶》流传道：“天下好酒数杜康，酒量最大数刘伶……饮了杜康酒三盅，醉了刘伶三年整。”

传说固然夸张，但杜康造酒在我国历史上载誉已久。当然，人类造酒都是受大自然现象的启发，在不经意中发现酒的生成，经过多次的实验与加工，寻求最佳配置方法，最后酿成酒香四溢的琼浆。

猿猴造酒说

有人说，中国最原始的“酒”是由猿猴所采集的野生花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堆积，自然发酵而成的花蜜果酒，后人称之为“猿酒”，由此也产生了“猿猴造酒”说。“猿猴造酒”，听起来很荒唐，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



图 1-4 猿猴造酒

在我国古代的典籍文献中，有关“猿猴造酒”（图 1-4）的历史记载屡见不鲜。

（1）东汉学者高诱曾在《淮南子》的《汜论篇》中的“猩猩知往而不知来”句下注释道：“猩猩……嗜酒，人以酒搏之，饮而不耐息，不知当醉，以禽其身。”

（2）明代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蓬拢夜话》中说道：“黄山多猿揉，春夏采杂花果于石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野樵深入者或偷得之。”

（3）刘柞蕃的《清稗类钞·粤西偶记》则记述了其在广西有关“猿猴造酒”



的见闻：“粤西平乐（今广西东部）等府，山中多猿，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石。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

我国近些年来多处“猿酒”考古遗迹的发现则为“猿猴造酒说”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科学依据，使该学说的可信度大大提高。

（1）195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的专家们在江苏洪泽湖畔下草湾河床的施工现场意外地发现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的“下草湾人”，并证实这些猿人是喝了含有酒精成分的野果汁，醉倒致死而形成的化石，因而首次将其命名为“醉猿”，并定名该化石为“醉猿化石”。

（2）1977年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李传夔教授，在苏北古镇双沟镇附近的松林庄的考古现场发掘出至今亚洲发现时代最早——距今已有1800万年的历史长臂猿化石，并将其命名为“双沟醉猿”。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古猿化石居然都浸透着酒的印记！

（3）2002年1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徐钦琦、计宏祥一行专门对江苏双沟地区下草湾“双沟醉猿”化石发现地进行科学考察，进一步证实了前两次的“醉猿”考古发现。

此外，还有一些近现代的真实故事也从侧面反映了“猿猴造酒”的传说。

1985年10月9日《安徽日报》的《繁花》副刊上，鲍杰先生在“黄山趣猴”一文中透露了其在黄山发现“猴儿酒”的趣闻：“有一年，我同老画家程啸天一起游黄山的皮篷峰，那里峰高、峦险、谷深。程老是黄山人，他说，在这里我们用心找找，也许能找到猴儿酒。此酒既能解渴，又能补身。于是，我四处寻觅，在一处草窝下发现有一泓用大石板盖着的黄澄澄的水，酒香扑鼻。程老尝了尝，连声说道：‘猴儿酒，肯定是猴儿酒！’我用手捧着喝了一口，果然酒很香，且甜而微酸，仿佛橘子水、柠檬水似的，喝来爽口、解渴。”

上述的相关资料已经给“猿猴造酒”说的真实性提供了相当有利的证据。那么，从技术层面来说，猿猴到底可不可能采花果自酿成酒呢？

第一，酒是一种发酵品，它是由一种称作酵母菌的微生物分解糖类而成的。而酵母菌又是一种分布极其广泛的菌类，尤其在含糖分较高的水果中，这种酵母菌更容易繁衍滋长。当成熟的野果坠落下来后，由于受到果皮或空气中酵母菌的作用影响而生成类酒饮品，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第二，含糖分较多的野花果是猿猴的重要食品。猿猴群居深山老林中，

遇到落地堆积发酵后带有酒味的果子和果汁，在很偶然或饥饿的情况下尝了尝，觉得这种果子别有风味，于是就专门将野果采集放在“石洼中”或山洞中，让它们自然发酵后再拿来享用。

第三，据科学家考证，生活在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就已经能够保存火种。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猿猴不论是智商或是劳动经验，都略胜一筹。因此，猿猴受野果自然发酵的启示，在依靠采集野花果度日的同时，用多余的野果“造”酒也是可能的。

不过，猿猴“造”的这种酒与人类酿的酒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不像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酿酒，它们酿造的酒是建立在天然果酒的基础上的，充其量也只能是带有酒味的野果。当然，猿猴从最初尝到发酵的野果到自己学会“酿酒”，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究竟经历了多长的时间，那就是谁也无法说清楚的事情了。因此，“猿猴造酒”并非虚构臆造，而是有证可考，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上天造酒说

酒在远古人们的心中，以独特的味道及其对人身体的特殊作用，被看作是一种很神奇的物质。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历史中，认为酒是由上天“酒星”（图1-5）酿造的古籍或诗句就不胜数。

唐代卢肇的《唐逸史》中关于“酒星”的记载“太白酒星，仙品绝高，每游间饮酒，处处皆到”就是酒星造酒传说的最好的阐述。这也是“上天造酒”说的第一种解释。

唐代房玄龄等撰写的《晋书·天文志》中，就有关于酒旗星座的描述：

“轩辕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飨饮食。”轩辕是中国的古星座名，一共十七颗星，其中十二颗属狮子星座。酒旗三星，就是狮子座的。这三颗“酒旗星”，呈“1”字形排列。由于亮度太弱或距离太远，酒旗三星仅用肉眼很难辨认出来。

宋代窦革在《酒谱》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与



图 1-5 酒星



天地并矣。”意思是自宇宙天地生成之日起，酒星就开始酿酒了。

唐朝大诗人李白《月下独酌》组诗之二中有“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中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的诗句，而他素有“诗仙”之称。

从以上的资料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上天造酒”只是一种传说，这显示出古代劳动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也反映了古人由于条件限制认知的局限性。

有关酒的记载，有的古籍认为神农时代就有酒了，也有说帝尧、帝舜时就有酒了。不管酒起源于何时何地何人，以当今高度的科学技术结合考古研究来看，最初的酒绝不是有意制造，而只能是无意中发现的。如前所述，酒是粮食和果品自然发酵形成的，即粮食和水果在一定温度下滋生出酵母菌，然后变馊，到一定程度恰好就是酒味。事实证明，酿酒方法的创造发明，不可能由某一个人完成。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开花落 年复年——酒的发展

酒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回顾酒的发展历史，几乎是与人类文化史一起开始的。在酒出现之后，首先是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存在，形态多种多样，发展到后来，酒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还具有精神文化价值。我们回顾酒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时期。

夏商周时期

上古时期虽出现了酒，但只能算是原始的酒。到了夏商周时期，农业技术进步，出现多余粮食，农业和粮食虽有官员管理，但比较松弛，酿酒业也很少有记载。

夏桀能凿出酒池，堆糟为丘，这说明在夏朝末期酿酒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在商朝贵族的墓葬中，随葬的酒器紧贴棺木，可见商代社会饮酒之风盛行。商朝人促进了酿酒技术的发展，并用人工酒曲酿酒，提高酒的产量。



图 1-6 周代酿酒工艺

到了周代，酿酒工艺比商代更完备（图 1-6），酒的种类也有所增加。《礼记》中就记载有醴酒、玄酒、清酌、澄酒、旧泽等多种酒类。

1974 年 11 ~ 12 月间，在河北开平考古发掘中发现，在一座战国时期中山国王的墓中有两只精美的铜酒壶，里面贮存的两种古酒依然酒香浓郁、澄澈透明，至今已经有 2 300 多年了，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陈酿美酒。

通过考古分析，周朝管理酒的机构中已经产生了专业技术人才，他们掌握固定的酿酒方法，建立酒的质量标准。据《周礼·天官·酒正》记载，酒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和规格。

（1）王宫内酒的分类：“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所谓“三酒”即事酒、昔酒、清酒。“事酒”是专门为祭祀而准备的酒，有事时临时酿造，酿成后立即使用，无须经过贮藏，故酿造期较短。“昔酒”则是经过贮藏的酒。“清酒”大概是最高档的酒，要经过过滤、澄清等步骤，这也表明周代酿酒技术较为完善。

（2）按酒的清浊，分为五等，合称“五齐”。“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缙齐，五曰沈齐。”所谓“五齐”是指酿造出的不同规格的酒，其中“泛齐”是含有酒滓，味道很淡的酒；“醴齐”是一种酒汁和酒滓相混合，而且带有甜味的酒；“盎齐”是白色的浊酒；“缙齐”是黄色的酒；“沈齐”是去掉酒滓的清酒。

秦汉时期

西汉承秦末大乱之后，统治者减轻劳役赋税，与民休养生息，促进农业生产，工商业活跃，为酿酒业的发展和兴旺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天下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酒的消费量相当可观。

汉朝时，人们称稻米酒为上等、稷米酒为中等、黍米酒为下等，而且酒的种类多，有桐到酒、肋酒、恬酒、柏酒、桂酒、菊花酒（图 1-7）、百未旨酒（一名兰生）、椒酒（椒酒是用花椒籽浸制的酒）、斋中酒、听事酒、香酒、甘醴、甘拔等，可见汉代酒业的鼎盛。



东汉末期，曹操发现家乡已故县令的家酿法，即九酝春酒法，比法所酿的酒醇厚无比。“九酝春酒法”，现代称“喂饭法”，在发酵工程上归为“补料发酵法”。“春酒”即春季酿的酒；而“九酝”即分九次将酒饭投入曲液中，直至发酵酒熟止。可见此时我国酿酒技术有了进一步的突破。这种方法后来成为我国酿造黄酒的最主要的加料方法。

在汉武帝建元年间，汉使张骞出使西域，在从大宛引进葡萄的同时招来了酿酒艺人，为我国后来的葡萄酒酿造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之际，司马氏和曹氏的夺权斗争十分激烈、残酷，氏族中很多文人雅士为回避矛盾尖锐的现实，往往纵酒佯狂，出现了一些热衷于饮酒的团体，如“竹林七贤”（图 1-8）。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记载：他们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图 1-7 汉代菊花酒



图 1-8 竹林七贤

魏晋时期文士们不但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因此崇尚玄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寻找精神寄托，用清淡、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例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无论动静都随身携带饮酒器具，只是沉湎于杯酒，排遣心中许多寂寞与烦闷，暂时忘记烦恼与现实生活的无奈。

当时民间饮酒之风极其盛行，推动了酿酒技术进一步发展。当时的酒名有金浆（即蔗酒）、千里醉、骑蟹酒、白坠春酒、缥纹酒、桃花酒、梨花春酒、驻颜酒、榴花酒、巴乡清酒、桑落酒等。其中，桑落酒是我国传统的历史名酒，

有文献记载：“北魏，河东郡多流离，谓之徙民。民有姓刘名白堕者，宿擅工酿，采挹河流，酿成芳酎，悬食同枯枝之年，排干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最佳酌矣。”

魏晋南北朝时，不同地区所酿制的各种名酒纷纷出笼，仅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一书中就介绍有 40 余种宫廷御酒。此外，《齐民要术》中还记述了“造神曲并酒”、“白醪曲”、“笨曲并酒”、“法酒”等的造酒过程。

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是我国黄酒酿造技术最辉煌的发展时期，黄酒酿酒工艺流程、技术措施及主要的工艺设备至宋代基本定型。酿酒行业在经过了几千年的实践之后，传统的酿造经验得到了提高，形成了传统的酿造理论。

唐代流传下来的完整的酿酒技术文献资料较少，但散见于其他史籍中的零星资料极为丰富。宋代的酿酒技术文献资料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宋代最能完整体现我国黄酒酿造技术精华并在酿酒实践中最有指导价值的酿酒专著是北宋末期成书的《北山酒经》（图 1-9）。

《北山酒经》共分为三卷，上卷为“经”，其中总结了历代酿酒的重要理论，并且对全书的酿酒、制曲作了提纲挈领的阐述。中卷论述了制曲技术，并收录了十几种酒曲的配方及制法。下卷论述了酿酒技术。《北山酒经》与《齐民要术》中制曲酿酒部分的内容相比，显然更进了一步，不仅罗列了制曲酿酒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对其中的道理进行了分析，因而更具有理论指导价值。

在《北山酒经》的酿酒理论中，朱肱借用“五行”学说解释谷物转变成酒的过程。“五行”指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朱肱认为：“酒之名以甘辛为义，金木间隔，以土为媒，自酸之甘，自甘之辛，而酒成焉（酴米所以要酸也，投米所以要甜也）。所谓以土之甘，合水作酸，以水之酸，合土作辛，然后知投者，所以作辛也。”整理朱肱的观点，人们发现酿酒的过程可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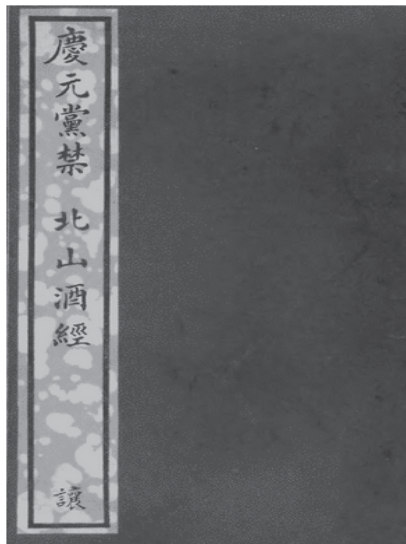


图 1-9 《北山酒经》



面的示意图表示：



在这一过程中可明显地看出酿酒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即先是谷物变成糖（甘），然后由糖转变成酒（甘变成辛）。

同时期，葡萄酒发展的情况可以从苏东坡、陆游等人的作品中看出来。如陆游的《夜寒与客烧干柴取暖戏作》中有一句“如倾潏潏葡萄酒，似拥重重貂鼠裘。”把喝葡萄酒与穿貂鼠裘相提并论，表明了当时葡萄酒的名贵。

唐宋时期名酒甚多，宫廷名酒有蒲中酒、苏合香酒、鹿头酒、蔷薇露酒、流香酒和长春法酒等。到了两宋时期，京城的名酒更是数不胜数，其中包括香泉酒、天醇酒、兰芷酒、玉沥酒、琼浆酒、玉液酒、流霞酒、清风酒、玉髓酒等。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酿酒历史的一个高峰，也是诗歌水平最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诗人创作的大量佳作大都与饮酒相关，酒与文艺紧密联系，所以该时期是我国酒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美酒与名诗珠联璧合、相映增辉，使酒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多彩。在诗的辉映下，酿酒、饮酒更加活跃，各类佳酿竞相争芳，使盛唐的名酒有美酒甲天下之盛誉。

唐宋时期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名酒更胜于前朝，特别是唐朝政府明令“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钱百五十，免其徭役”后，几百余年间，鼓励民间酿酒的制度基本上沿袭了下来，酿酒业及相关行业因此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到了宋代，统治者为增加税收，提出“设法劝饮，以敛民财”的政策，使得民众纵酒畅饮，城乡酒肆林立，民众当街沽酒，瓦肆听唱，酒楼夜市通宵达旦，可见于《清明上河图》。后来，宋朝还实行了酒税承包制度：一个人买下某一地区的酒税以后，就可以独占这里的酒利，其他的小酒店就成为他的附庸。这一制度又促进了酿酒业的进一步发展。

元明清时期

元朝

元代喝酒之风炽烈，群体庞大，上至宫廷贵族、士人大夫，下至平民百姓、贩夫走卒。尚饮的风气推动了酒业的发展，名酒佳酿和酒类的品种比前代要丰富一些，并且很多家庭都掌握简单的酿酒技术，民间普遍存在自酿酒的小

作坊。

元代已出现了用粮食制作的烧酒、葡萄酒、黄酒、马奶酒、果酒、小黄米酒、阿剌吉酒、速儿麻酒及各种配制酒等。其中，有三种酒（图 1-10）非常有名，流传甚广。

（1）烧酒，相当于现代的蒸馏白酒。

（2）马奶酒，又被称为“忽迷思”，最好的“忽迷思”需经过数次发酵提纯，使马奶在皮袋中变成甘美的酒类饮料，这种酒只有大汗宫中才有。

（3）米酒，是元朝北方农区的佳酿，米酒温热之后，比其他酒更容易使人醉倒。

明朝

明朝是酿酒业大发展的新时期，酒的品种、产量都大大超过前朝。据《明史·食货志》记载，酒税就按“凡商税，三十而取一”的标准，无疑极大地促进各类酒的发展。明代虽也有饮酒禁令，但大致上是放任私酿私卖的，政府直接向酿酒户、酒铺征税。由于酿酒普遍，此时不再设专门管酒务的机构，酒税并入商税。

明朝时期，民间以酒为日常的生活必需品，明代各级文武官员多狎妓饮宴，巨商豪富以及文人、市民们也皆如此。“三言两拍”中有许多关于此类事件的描述。“春来无处不酒家”，可见当时的酒店之多。这期间黄酒的花色品种有新的增加，有绿豆为曲酿制的豆酒，还有地黄酒、鲫鱼酒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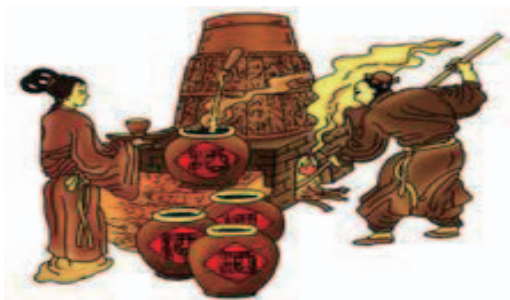
明代酿酒作坊和烧锅作坊遍及城乡，酒坊资金雄厚，有宽大的作场，又



元代烧酒遗址



蒙古马奶酒



元代米酒酿造图

图 1-10 元代三种名酒



有集中的技术力量，甚至已有负责行销的业务人员（这些业务人员被称为“水客”）。原料的采购也步入商业化的阶段，为了应付大产量，明中叶以后各大酿坊陆续出现，最著名的是绍兴县东浦的“孝贞”酒坊（图 1-11）。

“孝贞”酒坊坐落在福建东浦的越甫桥畔，当年这一带酒肆鳞次栉比。如今两岸已是住家，唯街南街北的门面依旧保留着旧时酒户模样，一眼看去就让人想起“风吹柳花酒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孝贞”酒坊得名有一个传说：

据说，当时明武宗微服来到这里，在酒坊后边店堂里沽酒品尝（这家酒坊所产的竹叶青酒，因着色较淡，色如竹叶而得名，其味甘鲜爽口），大为赏识，又得悉掌柜的竟是婆媳二人，越发惊喜，高兴之余，赠题了“孝贞”二字。回到北京，这位风流皇帝便一道圣旨将此酒钦定为朝廷贡品。

两百年后，乾隆南下巡视，也慕名前来。这位热衷于到处留墨宝的大清君主在品尝东浦佳酿后，自然又有一番挥洒，并赏赐金爵。自此，“孝贞”酒坊便将乾隆用过的这只金爵印在坊单上作为商标，酒坊名声因此大振。这只金爵至今仍存在酒坊传人手中，如有缘可一饱眼福。

明代酿酒作坊比较有名的还有：湖塘的“叶万源”酒坊、“田德润”酒坊、水井街酒坊、剑南春酒坊，以及“沈永和”、“云集”、“王宝和”、“越明”、“贤良”、“诚实”、“汤元元”、“陈忠义”、“中山”、“章东明”、“高长兴”、“善元泰”、“茅万茂”、“言茂元”、“谦豫萃”、“萧忠义”、“潘大兴”等酒坊。这些酒坊设施包括酒窖、炉灶、水井、晾堂及粮仓、池子、水沟、蒸馏。

清朝

清朝是我国酒类品种空前齐备的时代，出现了果酒，在北方产枣的地方多有枣酒，南方多产桑葚酒和荔枝酒，西北地区多流行青稞酒。黄酒以绍兴酒驰名，基本分为状元红、加饭、善酿三种。白酒多以汾酒为代表，酒色清澈，口感单纯。另外清末之时，啤酒已在我国酿制，各种浸制酒如露酒、金酒、



图 1-11 “孝贞”酒坊

雪梨烧酒、花香酒在大江南北纷争竞出。

同时，传统的酿酒术在继承中得以发展，蒸馏白酒的品种更加丰富。随着大酒坊的陆续出现，酒的产量逐年增加，销路不断扩大。于是在各酒坊的协商下，品种、规格和包装形式也就统一起来。为了扩大和方便销售，有些酒坊还在外地开设酒店、酒馆或酒庄，经营零售批发业务。

清乾隆年间，“王宝和”在上海小东门开设酒店；“高长兴”在杭州、上海开设酒馆；“章东明”除在上海、杭州等开设酒行外，又在天津侯家后开设“金城明记”酒庄，经营北方批发业务，并专门供应北京同仁堂药店制药用酒，年销量达万坛以上。

近现代时期

清末民初，开始了工厂化生产，机械、半机械化酿造，质量、技术虽有大幅提升，但由于企业思想保守，观念滞后，仍然无法达到大规模生产的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祖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工艺非常重视，大大促进了我国酒业的发展。

1952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拨款，修建黄酒中央仓库，并多次向外友人推荐黄酒。

1956年，绍兴黄酒与贵州茅台、山西汾酒、山东金奖白兰地等八种酒被国家正式命名为“中国八大名酒”。

1979年，全国第三届评酒会，将评比的酒样分为酱香、清香、浓香、米香和其他香五种，称为“全国白酒五大香型”。后来，其他香型发展为芝麻香、兼香、凤型、豉香和特型五种，并称为“全国白酒十大香型”。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市场经济的出现，品牌消费渐成主流。为扩大市场占有率，“广告酒”大行其道，企业借打“广告牌”提高产品声誉、塑造品牌形象。随后“名牌酒”渐显优势，企业走上了“品牌战略”之路。

回顾以上酒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 作坊酒阶段，自发明酿酒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酿酒一直受传统工艺、手工操作制约，生产能力低下，市场范围狭小。正所谓“风来隔壁三家醉，雨过开瓶十里香”。

(2) 清末民初。这一时期开始了工厂化生产，机械、半机械化酿造，质量、技术虽有大幅提升，但由于企业思想保守，观念滞后，仍无法达到大规模生产的水平。“酒好不怕巷子深”是其典型的思维写照。



(3)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市场经济的出现，品牌消费渐成主流，使企业走上了“名牌战略”之路。

(4) 从现在到未来，当知识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后，“文化”对于酒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日趋凸显，中国白酒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文化酒时代。

我国酒的发展不仅体现了人们的智慧结晶和对酒的情有独钟，更是酒自身魅力的一种表现。酒有雅俗共享之魅力，又有一种让世人着迷的特质，这才使得历朝历代的人们不断地在酒这个领域探索和发明，让酒不断地发展成熟。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酒宴文化

酒宴，也称“酒筵”、“酒席”、“酒会”。酒宴上高朋满座，觥筹交错，宾客欢喜，是一大快事。酒宴早已被我们的祖先注入了色彩绚丽的精神因素，如在天子祭酒、诸侯朝会、君臣集会、军旅出征、文人聚会乃至婚丧嫁娶、四时八节中，酒都发挥了不同的功用，成为不可缺少的形式。

古代酒宴在不同的场合，就会有不同的宴会主题，具体来说主要有国宴、皇家酒宴、官场酒宴、家宴、聚会酒宴等几种形式。

国宴文化

国宴，就是国家元首或政府为招待国宾、其他贵宾或在重要节日为招待各界人士而举行的正式宴会（例如，图 1-12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年国庆宴会）。国宴有很多特殊形式，有的用来慰问使节，有的用来犒劳将士，如此等等。国宴往往是反映国家盛衰存亡的特殊标志。

酺宴

酺宴是帝王颐养天下、布施皇



图 1-12 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年国庆宴会

恩的一种怀柔手段。酺宴一般在改元换代、皇宫大事、天垂吉相等情况下举行。其规模较大，短则赐酺一日，长则大酺七八日。

唐代张说在《东都酺宴》中写道：“合宴千官入，分曹百戏呈。乐来嫌景遽，酒著讶寒轻。”张九龄在《奉和圣制登封礼毕洛城酺宴》中写道：“大君毕能事，端宸乐成功。运与千龄合，欢将万国同。汉酺歌圣酒，韶乐舞薰风。河洛荣光遍，云烟喜气通。春华顿觉早，天泽倍知崇。草木毕沾被，犹言不在躬。”描绘了一幅帝王与文武百官普天同庆的众乐乐画面。

酺宴

酺宴又作“赐酺”，即旧时皇帝下诏特许臣民聚饮之宴。历代王朝遇新皇帝登位、帝后生日、丰收、平定叛乱等国之大事，常办此种盛宴。

“醋”常被我们用来比喻因感情而生的嫉妒之情，如“醋意”、“吃醋”、“吃寡醋”、“醋劲儿”、“醋罐子”、“争风吃醋”等俗语，这典故出自一段千古趣事。

话说唐太宗李世民觉得大臣房玄龄劳苦功高，赐给他一位美妾，没想到房妻抗旨，不准丈夫纳妾。太宗大怒，给她两个选择：一是服从圣旨，任丈夫纳妾；二是喝御赐的毒酒自尽。那房妻是个刚烈人物，宁愿喝毒酒寻死，但没想到她喝下的实际上是食醋。太宗捧腹大笑，大家才知道这原来是一场喜剧。

鸣玉宴

鸣玉宴，谓鸣玉佩而侍宴。唐李贺《河阳歌》：“今日见银牌，今夜鸣玉宴。”还有，《国语·楚语下》记载：“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飧之，赵简子鸣玉以相。”传说春秋时，晋定公为招待楚大夫而举行宴会，宴中赵简子鸣佩玉为礼，故称鸣玉宴。

出师宴

出师宴，是军宴之一（例如，图 1-13 为古代军队出师宴会），即军旅出征前祭旗、饮酒。政府首脑们非常重视



图 1-13 古代军队出师宴会



军事，常常亲临军中，赐以军宴，如战前有犒宴，战后有赏宴，平时有军幕之宴，以丰富士兵们的生活。

传说，曹操定汉中后分兵去救合肥，东吴趁曹军扎营未定，急派甘宁领兵劫寨。为鼓士气，吴王孙权亲赐美酒 50 瓶。大将甘宁先用银碗斟酒自饮两碗，然后对众将士说：“今晚奉命劫营，请诸公满饮一觞，努力向前！”说罢又同诸将士共饮，直到酒尽食绝。结果将士们无不奋力杀敌，曹军望风而逃。

皇家酒宴文化

在封建制度的集权统治下，各种皇家酒宴无不体现皇权的至高无上，带有维护统治的目的。这里介绍几种皇家酒宴。

养老宴

养老宴，是古时君主为年老更事致仕者而举行的宴会，《礼记·王制》中记载：“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

养老宴先祭祖，而后大家围坐在一起吃肉饮酒，较为淳朴。皇帝收养万民，以表关心子民，借喜庆大典“赐民共饮”，或遇到节令赏六七十岁的老翁饮酒，表示关心他们的健康，以示“扶衰养疾”。

章华宴

章华宴，指春秋时楚灵王在章华台举行的宴会。

传说，楚灵王荒淫无度，夜夜笙歌，醉生梦死。他特别喜欢细腰女子在宫内轻歌曼舞。于是，在容城修建了一个较为宏伟的建筑，即章华台。不少宫女为求媚于帝王，少食忍饿，为求细腰，故章华台也称作“细腰宫”。汉代荀悦《汉纪·武帝纪一》道：“楚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人散。”

凌虚宴

凌虚宴，指北齐文宣帝举行的宴会，该宴以香菌为主菜。在封建时代，菇菌被视为异物，从唐代开始，菌类常与牲羽鳞介等山珍海味共登盘餐。例如，唐代冯贽《云仙杂记》引《自庆传》：“齐文宣帝凌虚宴取香菌以供，品味广，出于石首（今属湖北）、铜宫（今安徽铜陵县）等处，有铜钉菌、分丝菌。”

定鼎宴

定鼎宴,指清代皇帝在改元建号时举行的宴会,始于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年)。清世祖定鼎燕京,在皇极殿举行宴会,这是清入关后的第一次大宴。

紫光阁位于紫禁城西侧的西苑中南海,是清朝皇帝阅射和殿试武举的地方。乾隆二十五年(1761年)紫光阁修缮完备,乾隆下旨将平定准噶尔部、回族的功臣画像悬挂于壁。第二年,乾隆在此地摆设庆功宴,图1-14所示的画真实地记录了平定西域的庆功情景——王公贵族、蒙古族首领、文武大臣及西征将士其乐融融的场面。



图 1-14 紫光阁赐宴图

官场酒宴文化

中国人历来崇尚无酒不成礼仪,呼朋唤友、把酒言欢本是人之常情。但这只是对老百姓或者君子之间的交往而言,如果是官场中的酒宴则相差甚远。古代官场的宴会种类繁多,名目各异,又各有特点,而且不免带上一层政治色彩。

选举宴

选举宴,是为选拔人才而设置的专宴。从先秦的射宴到隋唐以后的科举之宴,描绘了中国选举宴的发展轨迹。科举之宴,实际上是主考官(座主)与同年进士之间的联谊活动。

曲江宴

曲江宴,又称杏园春宴,因宋代曾设宴汴梁(今河南开封)城西琼林苑,



故又称“琼林宴”（图 1-15），即唐代科举考试结束后由皇帝为新科进士举行的宴会。进士放榜后，新科进士集会于曲江池旁的杏园，宴后赴慈恩寺塔下题名。

恩荣宴

恩荣宴，是封建科举时代皇帝举行殿试宣布名次后为新科进士举行的庆祝宴会。始于元代，设宴于翰林院并始有其名。宴会由钦命大臣一人为主席，读卷大臣、礼部尚书、侍郎、众考官及考生均参加宴会。同时伴有歌乐，依官员高低、登第名次行酒，随意斟取。



图 1-15 琼林宴

鹿鸣宴

鹿鸣宴，始于唐代，是封建科举时代地方长官每年仲冬为新科举人举行的庆贺宴会。乡试完毕后，由州县长官以乡饮酒礼宴考官、属僚、宾客以及新科贡士，张乐备席，牲用少牢，唱《诗经·小雅·鹿鸣》，故称鹿鸣宴。

宋代，殿试以后为文武两榜状元宴，同年团拜，亦称鹿鸣宴。

清代乡试放榜次日，巡抚于衙门宴请考官及中举士人，行举人谒见考官礼。清代时此宴会饌肴尚丰盛，后来流于形式，仅有淡酒一杯。

鹰扬宴

鹰扬宴（图 1-16），是清代为武科乡试新举人举行的庆贺宴会。武士之勇如鹰之飞扬，故名鹰扬宴。

武科新进士殿试完毕后，宣读皇帝诏命，并公布于西长安门外，次日兵部设宴，称会武宴（图 1-17）。兵部大臣、考官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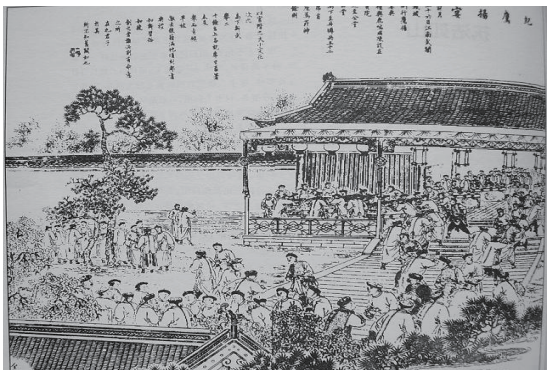


图 1-16 鹰扬宴



图 1-17 会武宴

及新科武进士皆参加宴会，并赏武状元盔甲、腰刀、靴袜等装束，其余中试者赏银两。比较而言，会武宴比鹰扬宴等级要高。

家宴文化

家宴，指人们在家中聚餐或在家中设宴招待客人的一种酒宴形式。宴席上一般无繁琐礼节，菜肴亦无固定形式，与宴者可自由交谈。国宴与官场宴会是国家 and 官场的一种沟通手段，相比之下家宴显得充满温情。家宴形式多样，下面列举几种。

送别宴

送别宴，顾名思义是为饯别设宴。它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的“祖祭”。此“祖”非祖宗之“祖”，而是道路之神。先秦时期，人们外出远行，必先设酒祭祀道路之神，以祈求旅途平安。后来发展成为送别时设宴践行，称“践宴”、“祖宴”、“离筵”。与宴者举的是离樽、离杯、离觞，饮的是由离酒，也称之为别酒。

宋朝诗人柳永在《雨霖铃》一词中写道“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亲人好友折柳送别，周边的环境都显得那样的感伤与离愁。

婚嫁宴

婚嫁宴，就是男婚女嫁时举办的宴会。这种大喜事必须伴以佳酿美酒，这也是我国许多民族共有的习俗。

许多民族在恋爱、订婚、结婚、回娘家及生儿添女时都要以酒称贺。相亲要有相亲宴；订亲要设订亲宴，吃“肯酒”，又叫“许口酒”；遇到时年三节，男家用冠花彩缎合果相送，谓“追节”，也要办酒；男方迎时，要送“撞门酒”；女儿陪嫁时，要送“女儿酒”，男女洞房时要喝交杯酒，称“合卺”。

这些家宴中，往往少不了“女儿红”酒（图 1-18）。它名称的由来有个美丽的传说。



图 1-18 女儿红

古时候，绍兴昌安门外有一个高员外，家底殷实，颇有财资，可惜膝下无后，甚是着急。高员外常带着夫人求神拜佛、问医求诊，直至中年，妻子终于怀孕了。员外喜出望外，想做点什么以示纪念，但究竟以何种方式为



佳呢？

员外召集家人商量，大家众说纷纭，最后还是账房先生说了句：“某以为酿一些佳酿，贮存起来，若得贵子，待其中举庆贺之日喝，取意为状元酒；若得千金，待其成年出阁时喝，取意为女儿酒，大家以为如何？”

话音还没落，大家齐声说言之有理。于是，高员外吩咐家人抓紧酿制了十八缸绍兴加饭，装坛密封后移至阴凉通风的库房存放。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高员外喜得千金，好不高兴。

光阴似箭，一晃18年过去了，姑娘成了亭亭玉立的美人，并经媒人牵线有了如意郎君。出阁之时，员外命家人抬出18年前贮藏的绍兴酒款待亲友。行酒之时，姑娘满身红装，加之面带羞色，更显娇态。亲友中有一秀才，因此酒甚美，已多喝了几杯，当他举杯欲向新娘贺喜时，看到红妆映酒分外红艳，秀才激情顿发，灵感忽至，脱口而出：“好一个女儿红！”大家听罢，齐声喝彩。从此，“女儿红”之名就开始外传，直至海外。“女儿红”现已成为绍兴酒中一个知名的品牌。

绍兴自古以酒乡闻名，可谓无处不酿酒，处处闻酒香。酒在绍兴人的生活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婚嫁这一人生大事中，“女儿红”成为当地人的首选。

少数民族的婚嫁也离不开酒。少数民族的婚姻较自由，饮酒歌舞是男女求偶的最佳机会。藏族男青年求婚要通过媒人向女方家长献哈达和酒；结婚时，新娘到达夫家前，男方必须在离家不远处设迎路席，给对方送新娘的人大碗敬酒。苗族人则由新娘捧着酒坛轮番给客人敬酒，客人不管酒量大小都必须满饮一碗。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 连营——历代酒政

中国酒政起源于夏朝，经过历代发展，主要形成了五个方面的内容：酒禁、酒法、酒专卖、征酒税以及历代设置的兼管或专管的酒政机构。所谓酒政，

是国家对酒的生产、流通、销售和使用而制定实施的政策的总和。

古代的酒政

酒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并不是商品，而只是一般的物品，后来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酒的经济价值与药用价值。之后，每个时期的统治者都会根据当时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关酒政。

夏商周时期

据《战国策》记载：“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事实证明夏禹的预言是正确的。夏商末君都是因为沉湎于酒而引来杀身之祸并导致亡国的。

直到公元前 11 世纪的周成王时代，西周统治者在推翻商代的统治之后，颁发我国最早的禁酒令《尚书·酒诰》。它的禁酒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逐渐构成中国禁酒的主导思想之一，并成为后世人们学习酒政的典范。从此围绕着禁酒与否，发生了一阵又一阵的争论，这种争论似乎成为各个朝代制定酒政的常态，不时地影响着酒政的制定和实行。

秦汉时期

1. 禁酒政策

《商君书·垦令篇》中记载：“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秦国的酒政有两点：禁止百姓酿酒；对酒实行高价重税。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方面，用经济手段和严厉的法律抑制酒的生产 and 消费，鼓励百姓多种粮食；另一方面，通过加重酒税国家也可以获得巨额的收入。

西汉前期实行“禁群饮”的制度，萧何制定的律令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新王朝刚刚建立，统治者为了杜绝反对势力聚众闹事，故规定禁止群饮。

汉文帝时规定“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显然这是为节约粮食下的禁止酗酒之诏。儒家的典籍中，曾大力宣传这种禁酒思想，从而使一些人把《尚书》、《周礼》中的“讥酒”、“谨酒”等观点视为金科玉律。受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整个封建社会中鼓吹或附和禁酒思想的人为数不少。



2. 榷酒政策

酒类专卖古时称“榷酒”或“榷酤”，主要是官府专卖，高价离利，监督产销，禁私缉私。

榷酒政策始于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二月。“榷”字，《说文解字》卷六本部说：“榷，水上横木，所以渡者也，以木崔声。”靠行政命是官府调节和引导酒的生产与流通的一种手段，与禁酒截然不同。实行榷酒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家的经济困难，保证了战争经费的开支。

汉武帝时期，财政官员兼任商品酒的生产管理，并实行两种主要的榷酒模式。

其一，国家完全控制酒的生产领域和销售领域，叫作完全专卖（或称直接专卖）。

其二，国家只是对销售领域进行严格管理，即私营酒作坊负责酒的生产，但要在官府开设的酒店里出卖，即“吏坐市列，贩物求利”。

王莽时期，榷酒制度有新的发展，并设置专职榷官——酒上，具体督责全国各郡县的榷酒事官，“郡一人，乘传转督酒利”，可见控制的极其严密。

榷酒的主要形式有垄断型、半垄断型、特许制三种。垄断型即由官府负责造曲、酿酒、运输、销售全过程，收入全归官府。半垄断型即官府只承担酒业的生产、专卖，其余环节由民间负责。特许制即特许商人和酒户按官府的条件经销。

3. 税酒政策

税酒，即对酒类设专税，主要是防止偷税漏税，使人人都有从事酒行业的机会。《汉书·昭帝纪》卷七记载，民户酿酒酤实不受限制，但必须按同家规定的数额交纳酒租，否则将以刑律处置。最早确定专卖税率的是西汉末年的王莽：“令官作酒……除米曲本价，计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截灰炭给上器薪樵之费。”

唐代时期

1. 禁酒政策

唐朝高祖武德年间，因粮食歉收而下诏禁止酿酒，措辞激烈：“沉湎之辈，绝业亡资……兵革未宁，年数不登，市肆踊贵，趋末者众，浮冗尚多，肴羞曲蘖，重增其费，救弊之术，要在权宜关诸州官民，其断屠酤。”

2. 榷酒政策

唐朝榷酒制度有了巨大发展。唐时除官府设肆卖酒外,又有官卖酒曲(榷曲)、由特许的酒户输榷酒钱(占酒价之半)、将榷酒钱分摊于青苗钱(地税附加税)上等多种变通的做法。

据《文献通考·征榷考》记载: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规定“随月抽税”;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规定了卖酒的税率,卖酒人每卖一斗“榷百五十钱”,以唐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一年计,全国的酒税钱即达156万余缗。

3. 税酒政策

唐代的税酒,主要是对酿酒户和卖酒户进行登记,并对其生产经营规模划分等级,给予这些人从事酒业的特权,未经特许的,则无资格从事酒业。这无疑使酿酒业受到很大的创伤,酒的买卖减少,国家也收不到酒的市税。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朝为应付军费开支和养活皇室及官僚,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通典》记载:“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之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为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统治者再次恢复税酒政策。

宋元时期

1. 税酒政策

为了收到足够的酒税,宋朝时对酒的生产 and 销售管理是很严格的。北宋初年实行禁酒的政策,不许私人酿酒。随着经济的恢复、生产的发展,酒的政策越来越松。北宋的酒政主要有三种形式:酒的专卖、曲的专卖和税酒。不同地区有所不同,如三京地区实行酒曲专卖;州城内实行酒的专卖;县以下的地方或实行纳税,或实行酒的专卖,这主要是考虑到各地方的特殊情况。

元朝时期,废专卖,允许百姓酿酒,由官司拘卖,每石缴税五两,设四品自提举司总领。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六月,大都设酒课提举司,开办槽房。大都槽房每年可创利十多万缗,由朝廷支配。此外,作为商品出售的酒曲须缴税。

2. 榷酒政策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自始至终实行榷酒制度的封建王朝。宋代榷酒滥觞于北宋,盛行于南宋。榷酒制度完备,形式主要有官监酒务(酒库)、特许酒户和买扑坊场,在局部地区还曾实行榷曲、四川隔酿法和万户酒制。



北宋的榷酒法主要有官榷制，在各州、府县城中设立酒务，专管酿酒、卖酒；买扑制，是指户民以竞争的方式承买官府的各种经营业务和税场的经营权、收税权；榷曲制，官设“曲院”酒户从曲院买曲酿酒，官府垄断造曲；特许酒户制，是向官府交纳一定税课而使私人获得酿卖权。

南宋的榷酒法在继承北宋的基础上又有了新发展，官榷制的范围较之前有所扩大。在榷酒的形式上，除了北宋出现的官榷制，买扑制和榷曲制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隔槽法，官府只提供场所，酿具，酒曲，酒户自备酿酒原料，向官府交纳一定的费用，酿酒数量不限，销售自负。

元朝世祖忽必烈之后，农业凋敝，灾荒不断，为节约粮食而颁布的禁酒诏令，其次数之多，堪称各朝之首。

3. 税酒政策

北宋时期，官府对酿酒的管理、对酒税的控制做得很细。酒的专卖，其做法是酒坊归官府所有，生产资料、生产费用、生产原料由官府解决，酒户从官府租来酒坊组织生产，酿成的酒由官府包销。酒楼是官府开办的饮酒吃饭的地方，酒库是官府酒的批发场所。此外酒曲专卖，官府能有效地控制酒的税收。

南宋也实行酒类专卖的政策，集中体现在酒库的设立及运营层面。谁掌握酒库，谁就掌握了酒的丰厚利润。南宋酒库名目繁多，隶属关系复杂，有归属中央政权的酒库，有归属军队的酒库，还有地方上的酒库。军队所属的酒库是为军队筹资而设立的，南宋政权基本稳定下来以后，政府机构逐渐将其收归为政府所属。

南宋朝廷为了抗击金兵，一再增加酒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成都府创隔槽法，由官家开设糟房，派专官管理，让民间“酿户各以米赴官场自酿”，但需缴纳一定的费用、头子钱及其他杂用。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潭州税酒，私酒入城，税官“数婴以税”，岁收入15万缗。

明清时期

1. 禁酒政策

明朝的酒政是比较宽松的，对酒的酿造与销售采取放任自流的税酒政策。但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以前，因粮食不足，曾发布禁酒诏令：“曩内民间造酒，靡费米麦，故行禁泐之令。”

清朝禁酒主要是禁烧酒，康熙皇帝谕令：“蒸造烧酒，多费米谷”、“苦令严禁，以裨民禽”。到乾隆统治时期，国力昌盛，丰衣足食，乾隆皇帝仍

然禁烧酒，主要是考虑到酿造烧酒耗费大量的粮食。

2. 税酒政策

明朝酒税稍轻，清朝前期也实行税率较轻的酒税制。酒税内容较多，有曲税、市税。从乾隆年间开始对从事经营酒业的业主颁发营业执照——“牙帖”，并限定其数额收税，超过者则属私造、私运、私卖，给予禁止、处罚。曲税，是指专门对制曲户征收的税；市税，是指对零星卖酒者所收的酒税。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政府当局为了弥补军费开支之不足，增加酒税。关于酒政机构，明朝设宣课司和通课司；清朝则由户部统一管辖。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酒政是实行禁酒、税酒、榷酒、酒专卖并存的制度。不但可以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是国家调节经济的一种重要手段，而且可以从宏观上加强对酿酒业的管理。但是，历代禁酒不成功也是有原因的：首先，酿酒业已颇具规模，饮酒习俗难以改变；其次统治者更离不开酒，祭祀、宴乐、重大节日都得用酒；最后，酒税是历朝历代重要的收入来源，弛禁往往有利于扩大税收，以供朝廷和官府的巨大开支。

近当代的酒政

民国政府分为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与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北京政府执政初期参照西方的酒税法制定了一些新的酒政形式，如“公卖制”。公卖制始于1915年。推行公卖制的行政管理机构有北京政府的烟酒公卖局和各省的烟酒公卖局。机构主要有：北京政府烟酒公卖局—省专卖局—分局—分栈—支栈—承办商（特许）。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同年6月公布《烟酒公卖暂行条例》规定以官督商销为宗旨。卖费率以定价的20%征收。每年修订一次。1932年公布《就厂征收洋酒类税章程》，实行就厂征收办法，即就厂一次征足，通行全国，不再重征。1933年公布《土酒定额税稽查章程》，国产土酒改办定额税。税率因酒的类别和不同的省份而有所区别。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以加强税收、充裕饷源为由，将各省土酒一律加征五成。1941年，国民党政府公布《国产烟酒税暂行条例》，规定烟酒类税为国家税，由财政部税务署所属的税务机关征收，还规定酒类税按照产地核定完税价格征收4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0多年中，基本上仍然实行对酒的国家专卖政策。但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环境不同，新中国酿酒工业在前30年，发展较为缓慢。改革开放后，尤其从1980年以后其发展尤为迅速，出现各



行各业办酒类的浪潮，国家对酒的管理策略有所改动。

1951年1月，中央财政部召开了全国首届专卖会议，明确专卖政策是国家财经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年5月，中央财政部颁发《专卖事业暂行条例》，对全国的专卖事业实行统一的监督和管理。专卖事业的行政管理由中央财政部税务总局负责，组建中国专卖事业总公司，对有关企业进行管理。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改变专卖行政机关与专卖企业机构在全国范围内不统一的混乱局面，商业部拟定《各级专卖事业行政组织规程（草案）》，同时为保证专卖事业严格执行《中国专卖事业公司制定商品验收责任制试行办法》，规定酒类的收购单位必须设专职验收人员，对较大的酒厂设驻厂员，小厂或小酒坊配设巡回检验员，实行包干负责制度。

国务院于1978年4月5日批转商业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加强酒类专卖管理工作的报告》，这一报告对酒类的生产、销售、运输、专卖利润以及偷漏税等情况都有具体规定。

1981年10月31日，商业部和轻工业部发出《关于由生产单位解决散装白酒酒度的通知》，散装白酒出厂前都要经过化验，符合质量标准才能出厂。

1983年6月13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加强酒税征收管理的通知》，用日常用粮酿酒的，按60%的税率征税；用饲料粮酿酒的，按40%的税率征收；用议价粮酿酒的，由于议价粮价格较高，仍按60%的税率征税，后来，在实际生产中用议价粮酿酒的税率有所降低。

1991年5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在复经济贸易部《关于开展寄售洋酒、啤酒、饮料业务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函文中指出：继续由经济贸易部对寄售进口洋酒实行严格管理，今且除寄售进口外，一律不再批准进口洋酒。对啤酒、饮料的进口，应建立起相应的管理制度，防止多渠道盲目进口。洋酒、啤酒、饮料的寄售进口业务，继续由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统一经营，其他单位不得经营。口岸收购站收购个人免税携带入境的洋酒、啤酒、饮料，须全部销售给中粮总公司或受其委托的有寄售经营权的单位，不得自行在国内市场销售。国务院办公厅还同意适当降低寄售洋酒、啤酒、饮料的进口关税，产品税同时也做适当调整。

总之，中国酒政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酒文化，保证了酒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使中国酒文化向顺乎礼仪、合乎礼德的方向健康发展。中国酒政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 无故人——酒人酒事

酒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以酒解饥，以酒招安，以酒赐慰，以酒避难，以酒消灭异己，以酒巩固政权。从西周时期开始，酒的社会化进程就已经开始，酒自觉或不自觉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在酒的掩护下演绎出一幕幕的政治悲喜剧。

以酒为器霸西戎之秦穆公

秦穆公（图 1-19），名任好，春秋时秦国国君。他任用百里奚、蹇叔等为谋臣，击败晋国，俘获晋惠公。向西发展，攻灭十一国，称霸西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穆公是春秋时期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不但善用人才，用酒结交“朋友”，更善于用酒软化自己的敌人，他一生的功业为秦国的雄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北周诗人庾信曾写过《秦穆公饮盗骏马赞》，诗曰：“骏马遇盗，秦王不嗔。先饮美酒，翻畏伤人。领兵向国，穷寇侵秦。于是大盗，还作功臣。”

故事是这样发生的。

一次，秦穆公乘车出游，车子右边车辕的马脱缰跑掉了，这匹马被一群农夫捉住。后来，秦穆公亲自去寻马，在岐山的南面看到农夫们正准备分吃马肉。秦穆公叹息道：“吃了马肉却不立刻喝酒，马肉会伤害你们的身体啊！”于是赐酒给农夫喝，而后离去。

次年，秦晋两国发生韩原之战，晋兵包围穆公乘坐的战车。当晋惠公车右的卫士路石举起长枪击中秦穆公的铠甲时，曾在岐山分食马肉的三百多农夫在车下为保护秦穆公而拼死搏斗。最后，秦军大胜晋军，成功俘获晋惠公。

这个故事详尽记载了秦穆公酒送盗马人的故事。秦穆公的这种仁德爱民



图 1-19 秦穆公



的气度为后世所盛赞。

秦军生俘晋惠公后，周襄王和穆姬不断在中间说情，于是秦穆公与晋惠公重新结盟。晋惠公送太子圉到秦国为质，把黄河以西的地方献给秦国，至龙门。晋惠公死后，秦穆公帮助公子重耳回国，是为晋文公。从此，秦晋交好。但晋文公去世后，秦晋又交恶，两国大战，秦国失败。秦东扩南进的路，被晋国阻挡，遂转向西边发展。

秦国西边有许多戎狄的部落和小国，常常突袭秦的边地，抢掠粮食、牲畜和人口。西戎诸部落中较强的是绵诸和义渠。绵诸国王的驻地就在秦的故土附近。绵诸王派使者拜访秦国。秦穆公隆重接待来人，并给绵诸王送去很多美女和美酒，并带去了动听美妙的音乐与舞蹈。从此之后，戎王终日饮酒享乐，不理政事，国内大批牛马死亡，也不加过问。后来秦军出征西戎，很快就包围绵诸，并且活捉绵诸王。秦军乘胜前进，使二十多个戎狄国都归顺秦国，这被后人称为秦穆公霸西戎。

宋江化酒裂变水泊英雄

《水浒传》中宋江（图 1-20）因怒杀阎婆惜而刺配江州。那一日，独自一个，闷闷不乐，便在“浔阳楼”上饮起酒来，三杯两盏，“不觉沉醉，猛然蓦上心来，思想道：‘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这里。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不觉酒涌上来，潸然泪下，感恨伤怀。”乘着酒兴，磨得墨浓，蘸得笔饱，去那白粉壁上写道：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写罢，虽然兴致淋漓，手舞足蹈，仍觉意犹未尽，又在《西江月》词下卒章显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酒醉方显出英雄本色。此时此境，宋江感怀身世，那压抑在心头多时的



图 1-20 宋江

雄才壮志，真正是怒潮澎湃，再也不可抑制了。白壁题诗，正是性格裂变的大动作，道出了他一生的政治抱负，这才有如此的千古绝唱。

鸿门假醉脱虎口之刘邦

秦末，刘邦与项羽各自攻打秦王朝的军队，刘邦先破咸阳（秦始皇的都城），但刘邦兵力不及项羽，项羽大怒，派当阳君击关，项羽部队抵达咸阳后，刘邦则在霸上驻军。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在项羽面前说刘邦打算在关中称王，项羽听后更加愤怒，下令次日一早让兵士饱餐一顿，击败刘邦的军队。

一场恶战在即，刘邦从项羽的季父项伯处得知此事，大吃一惊。刘邦两手恭恭敬敬地给项伯奉上一杯酒，祝项伯身体健康长寿。刘邦用真挚的感情拉拢说服项伯，项伯答应为他在项羽面前说情，并让刘邦次日前来谢项羽。

鸿门宴上，虽不乏美酒佳肴，却暗藏杀机。项羽的亚父范增一直主张杀掉刘邦，在酒宴上，一再示意项羽发令，项羽却犹豫不决。范增召项庄舞剑为酒宴助兴，趁机杀掉刘邦，项伯为保护刘邦，也拔剑起舞，掩护刘邦。

在紧要关头，刘邦部下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军门，怒目直视项羽。项羽见此人气度不凡，问来者为何人，当得知他为刘邦的参乘时便赐酒，樊哙一饮而尽，项羽见其爽快又命赐猪腿后，又问能否再饮酒，樊哙也不推辞。樊哙还帮刘邦说好话，项羽无言以对，刘邦乘机一走了之。刘邦部下张良为刘邦推脱，说刘邦不胜饮酒，无法前来道别，现向大王献上白璧一双，又向范增献上玉斗一双。不知深浅的项羽收了白璧，气得范增拔剑将玉斩碎。这场杀气腾腾的宴会中，酒自始至终起着麻痹作用，丰盛的酒宴暗藏着杀机，而对于樊哙来说，则显示了他的气魄、武勇。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图 1-21），这是一场项羽和刘邦之间的强强对话，楚汉群雄聚于新丰鸿门，一时风云际会。鸿门宴对秦末农民战争及楚汉战争皆有重要影响，间接地促成了项羽败亡而刘邦成功建立汉朝的结局。后人也常用“鸿门宴”一词比喻不怀好意的宴会。

青梅煮酒论英雄之曹操

“青梅煮酒论英雄”是《三国演义》里最为精彩的内容之一，是曹操与刘备二人的政治博弈。诗曰：“绿满园林春已终，二人对坐论英雄。玉盘堆积青梅满，金罍飘香煮酒浓。”



“煮酒”是以酿造方法命名的一类酒，即将原料与曲混合后置于钵中加盖，放进水锅，以微火、水浴加温，使之恒温发酵成低度的酿造酒，用青梅为佐饮之果。

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的公元196年，吕布打败刘备，攻占他的地盘。刘备只得带着关羽、张飞投靠曹操。曹操的谋士程煜劝告曹操赶快杀掉刘备，以免后患无穷。曹操当然也知道刘备绝非等闲之辈，但一则怕杀一人而有失天下人心，二则还想争取刘备，考察一下刘备究竟是何居心。刘备为防不测而采取韬光养晦之计，假装忙于在后园种菜、浇灌。

一日，曹操看到枝头梅子青青，又值“煮酒”发酵成熟之时，就把刘备请来，“盘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图1-22）。处境艰难的刘备生怕自己酒后失言而招来横祸，所以表现得十分谨慎。



图 1-21 鸿门宴



图 1-22 煮酒论英雄

席间，曹操以“共论天下英雄”为题，刘备佯装糊涂，先后列举出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刘璋等风云人物，均被曹操一一否定。曹操认为这些人虽有权势，但不堪称英雄。他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并断言：“今天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刘备害怕自己的计划和志向被曹操看出，一时吓得面如土色，竟然把手里的筷子失落在地。恰好正“天雨将至，雷声大作”，刘备以“闻雷而惊”为借口，掩饰自己的失态，骗过曹操。这场酒局是一场政治试探和政治表态的会面。曹操的睥睨群雄之态，雄霸天下之志表露无疑；而刘备随机应变，表现出一代豪杰所应有的技巧和城府。这场政治博弈，双方都是赢家。

耽于饮宴亡宗庙之陈后主

陈后主（公元553—604年），名叔宝，元秀，南北朝时期南朝陈国皇帝（图1-23）。他公元582—589年在位，在位时大建宫室，生活奢侈，不理朝政，日夜与妃嫔、文臣游宴，创作艳词，最后到了连国家大事也要“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的地步。

陈后主全然不管国事，只知道喝酒享乐，其殿下之臣多属无能之辈。此时，北方的隋朝已经强大起来，并且决心灭掉南方的陈朝。

公元588年，隋军大举南下。陈朝将士纷纷败退。几路隋军顺利进军到长江边，北路的人马到了京口，江边守将告急的文书接连不断地送到建康。陈后主收到警报，连拆都没有拆，继续和宠妃、文人们饮酒。后来战事越来越紧急，大臣们请求抵抗隋兵，陈后主才召集大臣商议，而众人皆不放在心上，继续夜夜笙歌。

公元589年正月，贺若弼的人马从广陵渡江，攻占京口。但陈后主这才着急，陈后主手下的宠臣没人能指挥军队。不久，隋军攻进建康城，陈军将士大多投降。隋军打进皇宫，到处找不到陈后主，后来在后殿发现一口井，隋兵就威吓要往里面扔石头，这才把陈后主吓出来了。最终陈后主被俘，落得个国破家亡、身陷囹圄的下场。

一杯清酒释兵权之宋太祖

唐亡以后，是五代十国军阀混战时期。后周大将赵匡胤手握兵权，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自知武将兵权过大，皇权难以控制，就容易导致兵变。于是，他吸取唐朝以来藩镇跋扈、拥兵自重的深刻教训，与谋士赵普商量如何“保位”。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二月一天夜晚，宋太祖赵匡胤备好酒宴，把当年战功卓著，现今重兵在握的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请过来。酒过三



图1-23 陈叔宝



巡，太祖屏退左右，似有感慨地对这些将领说：“我靠大家出力，登上帝位，你们的功劳铭记在心。但做皇帝太苦，实在不如做节度史快活。我是昼夜寝食不安呀！”

武将们听后感到莫名其妙，便问他为何不安。太祖叹道：“你们虽然忠心不二，我也很放心。只怕你们的部下，为贪图富贵，硬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想不干能行吗？”石守信、王审琦等人惊恐万分。

太祖见时机成熟，举起酒杯说：“人生有如白驹过隙，所谓富贵，只不过多积钱物，终日饮酒享乐，子孙也跟着享受荣华富贵罢了。你们何不交出兵权，多置田产姬妾，歌酒欢度，君臣之间上下相安，彼此互不猜嫌，这有多好啊！”

石守信等人虽心中不满，当夜宴罢却各自回府。次日上朝，这些将领都递上辞呈，交出兵权，称病回乡，太祖对他们厚加赏赐。宋太祖仅用一场酒宴便解决了困扰大唐很久的藩镇问题，这被后世称作“杯酒释兵权”（图 1-24）。

总而言之，酒被运用到更大的范围内，广泛地进入了政治领域，并扮演了各种角色。它或成为赐品，也是诱饵；或用以化干戈为玉帛，也会带来重重杀机；或成为友谊之桥梁，相反也是置对手于死地的武器；或成为结盟誓师之信品，用于结束对方权力的手段；或用以招贤纳士，也可排斥异己；或用以激励对方，也可丧人之志。其实酒无罪，操纵酒的是活跃在政治活动中的人物。



图 1-24 杯酒释兵权